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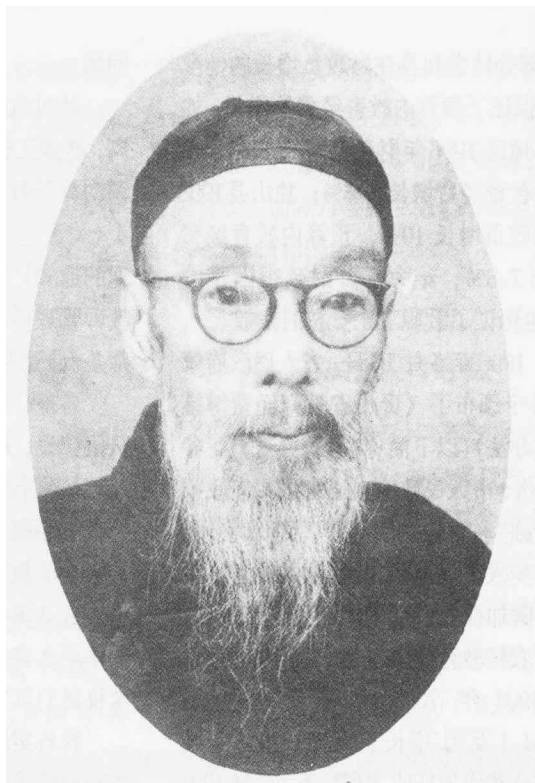
在执法检查中，对上级检查纠正的问题仍采取不以为然的态度等等。为此，应当加强义务教育法律法规的宣传，特别要加强对行政执法人员依法行政意识的教育。要进一步明确各部门执行义务教育法规的职责，将他们履行职责的情况纳入年度目标考核内容。对明显违规的，各级人民政府应及时予以纠正。各级人民政府要定期将义务教育执法情况报告同级人大常委会，自觉接受人大监督。

2、依法确保财政主渠道对义务教育投入的逐年增长，做好地方教育费附加的征收、使用和管理的工作。1994年以来，虽然省级财政对教育的投入基本做到“三个增长”，但部分地、县并未达到《教育法》规定的要求。大多数地县的第一个增长即“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应当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财政收入的逐步提高而逐步提高”未能实现。有三分之一的地、州、市教育投入增长的比例较财政增长比例低得多。生均教育事业费和生均公用经费也严重不足。作为筹措教育经费的重要渠道——地方教育费附加的征收情况亦很不平衡，使用和管理也存在漏洞。只有极少数县开征了旅馆业的床位费、广告业娱乐业教育费附加；部分地、州、市未将所征地方教育费附加拨给教育部门使用。农村教育费附加的征、管、用也存在一些问题。这些现象，只能通过严肃法制，规范教育费附加征、管、用来解决。

3、中小学教师数量严重不足，学历也有待于进一步提高。随着我省“普六”、“普九”进程的加快，部分地区教师数量不足与代课教师迅速增加的状况必须引起足够重视，如遵义市现有代课教师达11452名，占当地教师总数的20.5%。这些教师多数未受过专业培训，学历层次也达不到要求。我们应当在继续争取“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支持的同时，尽力加大各级政府对教育的投入，挖掘师范院校及非师范院校中师范专业的招生潜力，拓宽“支教”形式、范围和队伍，鼓励非师范院校毕业生到学校任教，并进一步督促各地依法足额征收教育费附加，切实保障教师待遇，稳定教师队伍，解决教师紧缺的问题。

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将“实施素质教育”提到了当前教育工作的核心地位。省委、省政府已于1999年9月8日出台了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的意见，要求全省各级党委、政府、广大党员、干部和各族群众必须审时度势，提高认识、解放思想、振奋精神、齐心协力，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我们应当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做好为富民兴黔而夯实教育基础的工作。

(作者单位：省教委政策法规处)



# 九死一生求光明

——纪念周素园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

文·图 熊宗仁

**周**素园(1879—1958),名培艺。贵州毕节人。他是近代贵州第一报人,参与创办了《黔报》和《西南日报》,志在唤醒民众,救亡图存。他是辛亥革命时期贵州革命党人反清起义的主要策划者与领导人之一,清贵州巡抚将他列为秘密诛杀的革命党要人。辛亥革命失败后,他组织“黔人冤愤团”,奔走呼号,冀挽狂澜于既倒,大总统袁世凯曾把他当作“双重罚人”下令通缉。为向反动势力复仇和求真理、求生存,他在军阀的黑暗统治下苦苦求索。军阀头目们利用他崇隆的人望、横溢的才华和纵横捭阖的韬略,纷纷延揽他为“人幕之宾”。在贫病交加、颠沛流离中,他阅读到一批马列主义的著作,模糊地看到了光明。红军长征经过毕节时,他认定自己找到了光明,成了党所领导的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中国工农红军中特殊的老兵。他历尽艰险,跟随红军胜利到达陕北,积极参与做国民党军政要员的统战工作并担任红军大学的教员。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被任命为八路军高级参谋;后根据本人意愿并经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同意,返乡为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长期从事对国民党上层和社会各界的统战工作。国民党特务曾企图将他杀害或劫持出逃。贵州解放后,他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贵州省人民政府第一位民主人士副主席(后改副省长)直至逝世。他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邓小平、刘伯承等人请他出任贵州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时,他再三以年老体衰推辞。邓小平说:“素老负责意义主要是联系群众。干脆说,只要有你的名字摆在那里好了!”在任上,他日理万机,抱病工作,从不假手于人。他曾说他愿当一座“桥”,群众也说他是一座“桥”,沟通了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时任中共贵州省委第一书记的苏振华感慨地说:“再也找不到比周素园更合适当副主席的人了。”

1937年10月,毛泽东曾称赞周素园“是我们的一个十分亲切而又可尊敬的朋友与革命同志”,“是一个奋斗的人”!这是对他前半生的高度赞扬,也成了他后半生的真实写照。他的后半生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成功

的杰出范例,他同时又是我党卓越的一战线工作者。他的思想、业绩、人格、精神和数百万字的著述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与弘扬。

### 从执著的民主主义者坚定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爱国思想

从真诚的爱国主义走向社会主义,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成长为社会主义者的必由之路。周先生的坎坷经历、辉煌历史和心路历程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马关条约》丧权辱国的奇耻大辱,给蜷居乌蒙山中的少年周素园以极大的刺激,他与当时中国的先知先觉者们一道,相率发愤自强,迈出了他从“学而优则仕”、“光宗耀祖”向读书为了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重要一步。1904年,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日俄战争中,日本占领辽阳后,受聘在贵阳师范学校教书的日籍教习置酒庆贺,强迫诸生痛饮,狂呼“日本万岁”,强迫诸生应和,从而激起该校学生罢课反日抗议风潮。周素园得知这一消息后,深为学生们的爱国思想激动,呼吁当局对学生的爱国行动要加以“调护”、不能“复加摧折”,学可罢,交可绝,而不能敷衍周旋,草率了结。他在主编《黔报》、《西南日报》期间,亲自撰文,传播新思想、新学识,号召救亡雪耻,反对列强。他编发在《黔报》上的一篇《瓜分之警告》的文章,直接促成了爱国救亡团体贵州自治学社的建立。这一组织尔后成了辛亥革命中贵州革命派的中坚。周素园是贵州反清武装起义的主要策划者和领导人之一。贵州军政府成立后,他担任行政总理,主持全省民政。当贵州反动势力勾结滇军颠覆了贵州军政府后,他被迫流亡他乡,辗转重庆、武汉、北京、上海等地,联络同志,伸张正义,为挽救革命而不遗余力。他在民国初期军阀混战的20多年里,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和为使贵州脱离苦难深渊而苦斗求索,然而,在没有找到共产党和红军以前,他四处碰壁,理想总是不能实现。他怀着炽热的爱国之心,从各种思想学说的论争中认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各派社会政治力量的生死较量中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最终实现了自己救国家于水火、拯生灵于涂

素老先生：  
 我们党的历史，  
 从辛亥革命到现在的历史，  
 与素老先生，是不可分割的。  
 素老先生的革命精神，  
 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素老先生的革命精神，  
 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素老先生的革命精神，  
 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素老先生的革命精神，  
 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素老先生的革命精神，  
 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素老先生的革命精神，  
 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炭的理想,使自己人生的转折与中国历史命运的转折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成为他那一时代爱国的封建知识分子转变为坚定的社会主义战士的杰出典范。

### 为了国家民族的解放,为了家乡贵州不再贫穷落后,虽九死而不悔的奋斗精神

周素园不是崇尚清淡、空怀理想的旧式知识分子,而是为了追求理想而勇于实践、甘愿毁家献身的无私无畏的爱国者,是把爱国救国的激情与热爱贵

州、拯救贵州的脚踏实地的奋斗结合起来的实践者。他为了反对列强对中国的瓜分，为了推翻封建帝制，冲破世俗的偏见，冒着杀头坐牢的危险充当革命的播火者。他担任贵州军政府行政总理时，反动派发动政变，子弹从他耳边擦过，敌人的利诱和威胁都没有使他屈服。他被通缉，几次险些落入敌手，流亡途中，贫病交加，出生入死，从不气馁。他以57岁高龄参加红军长征，途中，组织上曾准备拨一笔钱，动员他到香港养病并做统战工作，他激动地说：“我今年快60岁了，以前都没有找到光明。今天参加了红军，正是我一生中最高光的时刻，死也要死在红军里。我不愿离开红军！”他在从贵州经云南、四川、甘肃到达陕北的近万里的艰险历程中，经历了生与死、苦与乐的严峻考验，革命意志从不稍减。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给远在贵州的家人写信，表示他愿为抗日而牺牲在战场的决心。他在国民党反动派的高压下从事统战工作，盼望光明，追求光明，从不懈怠。贵州解放后，他为贵州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建言献策，日理万机，鞠躬尽瘁。毛泽东同志在给他的信中称他为“一个奋斗的人”，则可以是对他人生的高度概括。

### 敬仰马列主义，与中国共产党同呼吸共命运的无比忠诚

1923年至1924年间，周素园寓居上海，开始接触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初步了解了共产党的一些主张，他依稀看到自己多年所追求的真理，正闪耀在中国共产党的身上。1925年，周素园回到毕节，闭门读书著述，反思自己在政治风云中的得失，探索自己人生的真谛和中国的出路。他从上海带回大批图书，其中有不少马列原著和介绍马列主义的书籍，如《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通俗资本论》、《共产主义ABC》、《新政治经济学》等等。他认真研读，臆臆地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

1935年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六军团占领黔西、大定（今大方）、毕节，建立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并在中共贵州省委的协助下筹组贵州抗日救国军。红军战士在毕节县城打土豪分浮财时，看到周素园居住的楼宇算得上城中一流住宅，

误把他当作“土豪劣绅”抓起来。在群众大会上，问到周素园的为人时，穷苦百姓交口称誉。在抄家时，发现他读过的许多马列著作上，用红笔认真地作了批注和圈点。红军战士诧异不已，赶紧向军团首长王震、夏曦汇报。偶然的误会，使周素园的人生与中国革命发生了必然的交汇。王震、夏曦同周素园见面时，问他的经历，问他为什么读马列主义的书籍，为什么红军来了不跑。他说：“我研究马克思主义10年了，我觉得马克思讲得对，我相信马克思主义。你们共产党、红军，是讲马克思主义的，所以我用不着走。”王震说：“你研究马克思主义好。我们共产党现在的政策要抗日反蒋，你赞不赞成？”周素园连声说：“赞成，完全赞成！”王震等红军首长十分高兴。此番晤面，他们成了朋友。根据周素园的经历、声望和现实表现，军团首长请他担任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他慨然允诺，并立即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在跟随红军长征的前后，他充分利用自己的社会影响和与滇军上层人士的故旧关系，开展统战工作，使滇军前敌总指挥孙渡对蒋介石和龙云的指令阳奉阴违，尽量避免与红军正面交锋，为红二、六军团顺利通过云南、渡过金沙江创造了一定条件。在离开贵州到达甘孜的长征路上，周素园一直与王震同吃同住，有时还同床而眠。王震对他百般照顾，给他讲解了许多革命道理。在过草地时，贺龙省下自己的口粮，派通信员送给周素园，感动得他热泪盈眶。王震在《周素园文集》的《序》中称周素园“是我党和我军的老朋友和忠实同志，也是我个人的老朋友和忠实同志”。从周素园跟着共产党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起，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都与共产党生死相随，荣辱与共。他不愧是共产党的忠实的战友和可信赖的挚友。周素园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王震、肖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有过倾心相与的革命情谊。

### 追求真理，中国共产党人的诤友的高贵品质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漫漫征途中，在敌人所设置的和我们自身的错误、失误所造成的艰难险阻中，许许多多的爱国民主人士与共产党人风雨同

舟、患难与共，他们不愧为中国共产党的战友、挚友。但是，像周素园那样，既是战友、挚友，又敢于敞怀直言，却未必人人都能做到。他对共产党的拥戴之诚、对革命的责任感、对个人得失的置之度外，都十分令人钦佩。1937年底，他离开延安回贵州从事统战工作前，应毛泽东同志之请写下了临别赠言。他从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比较中，认定了共产党一定能得天下，得政权。但他耽心革命胜利后有的人会变质。因此，他在临别赠言的最后写道：“希望取得政权后，共产党不要变质。”今天，重温这一赠言犹如警钟萦回，多么发人深省啊！建国初期，特别是农业合作化后期开始出现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左”的急于求成、急躁冒进的倾向的时候，尚少有人警觉。周素园以他对共产党的坦诚和热爱、对人民事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精神，于1956年11月上书毛泽东同志，希望纠正和制止“左”的倾向和“强迫命令”、“主观武断，不按政策办事”、“脱离群众”的做法，真真正正给90%以上的人民群众以增加收入的实惠。他为此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建议。这封信虽然由于种种原因被省里留下，没有能寄给毛泽东同志，但却很能反映周素园对共产党的一片赤诚。他这种以战友、挚友身份“犯颜直谏”的诤友精神，是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他高尚的人格和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另一个侧面的写照。

周素园的一生，横跨了19、20两个世纪的风云，经历了清王朝、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代的沧桑，参与了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三大历史性的巨变，他是贵州近代历史的见证和历史发展的积极推动者。他的经历，充满了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机遇契合或失之交臂的传奇色彩，是贵州各族人民追求光明与进步的一个缩影。他爱国、探索、奋斗、进步的一生，给后人留下了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榜样力量。在当今我们所从事的富民兴黔、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跨世纪的伟业中，周素园的爱国思想、奋斗精神和崇高品质将与我们同在，将与我们的事业共永。

（作者单位：省社科院历史所）